

# 做好“水文章” 变生态优势为发展胜势

——江浙地区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路径与政策启示

**编者按** 本期理论版聚焦生态治理、基层党建、民主实践与干部培训等多维议题，展现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创新路径与制度探索。江浙地区以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红色基因融入基层党建，夯实组织根基；协商民主实践助力治理效能提升；党校专题研讨淬炼干部政策执行力。多篇文章从实践出发，提炼经验、提出对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与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

□ 余平飞

随着“双碳”目标推进和生态文明建设深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战略要求。2021年《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强调，要“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在此背景下，江浙地区作为拥有长江、太湖、新安江等重要水系的经济活跃区域，通过制度创新和实践突破，逐步形成以“市场交易+产业融合+生态补偿”为核心的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模式，为全国提供了示范样本。

从水权转让到金融创新的市场化交易。江浙地区积极探索水权交易、生态资源经营权流转等市场化手段，推动水生态产品价值显性化。在水权交易方面，浙江淳安县与建德市基于新安江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完成5000万立方米水权交易，缓解了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江苏泰州泰兴市达成首单企业间水权交易，通过价格杠杆倒逼企业节水，扬州与安徽天长市完成首单跨省水权交易，实现“同一水系、就近取水”的资源优化配置。在生态资源经营权流转方面，浙江开化县和德清县通过公开拍卖

水域滩地经营权，在马金溪、洛舍漾等水域开发游船、垂钓等文旅项目。安吉县将石门坑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旅游资源6年经营权以3328万元溢价成交，创全国水土保持领域生态产品交易纪录。此外，浙江还创新性推出水利基础设施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开创了“盘活存量资产、带动新增投资”的投融资新模式。

从生态治理到“两山转化”的产业融合。江浙地区将水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形成“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制造”的多元产业体系。在生态农业领域，江苏扬州沿湖村通过退渔还湿、发展渔家文化旅游，实现从“捕鱼村”到“网红村”的转型。浙江安吉依托小流域综合治理，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旅游资产，吸引社会资本开发民宿、露营等项目，带动村民人均年收入增长。在生态工业领域，浙江湖州通过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将生态价值纳入企业贷款评估体系，推出“GEP生态价值贷”等金融产品，为生态友好型企业提供低息贷款。

构建标准化价值核算与产权界定体系，夯实转化基础。江浙地区的实践表明，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提是解决“价值量化难”与“产权模糊化”问题。其他地区可

借鉴其经验，建立“核算—确权—交易”的基础制度链条。例如，参考浙江湖州“GEP+VEP”核算模式，针对供水、水质调节、文化服务等不同类型水生态产品，制定包含生态参数、经济成本、社会效益的量化指标体系，并通过卫星遥感、物联网监测等技术实现数据动态更新，为生态补偿和市场交易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要对水资源、水域岸线、水生态系统服务等要素进行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层设权，明确政府作为所有权代表的监管职责，放开经营性使用权流转，允许经营主体通过拍卖、租赁等方式取得水域旅游开发、生态养殖等经营权，破解“资源公有、使用无序”的困境。

创新市场化补偿与产业协同机制，激活转化动能。江浙地区通过“行政引导+市场运作”双轮驱动，将水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路径，为其他地区提供市场化机制设计的核心范式。一方面，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工具，在新安江跨省补偿“水质对赌”模式基础上，拓展“资金补偿+产业反哺+技术合作”的复合补偿体系。例如，在下游地区设立生态产业基金、共建飞地园区，向上游提供产业扶持，替代单一资金转移；借鉴江苏太湖以奖代补政策，将补偿资金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挂钩，形成“治理成效—补偿激励”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推动生态产业融合发展，依托水生态资源禀赋，打造兼顾生态保护与产业价值反哺的链条。例如，江苏扬州沿湖村通过退渔还湿发展文旅产业、浙江

安吉将小流域治理与民宿经济结合的做法，证明了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制造等业态的可行性，其他地区可探索将水生态修复与乡村振兴、全域旅游规划结合，通过生态资源挂牌交易结合社会资本参与模式，开发高附加值生态产品。

完善跨区域协同治理与政策保障体系，破除制度壁垒。水生态系统的流动性决定了其价值实现需突破行政壁垒，江浙地区在跨区域协同与政策落地方面的经验具有普适性启示。例如，参照浙皖新安江流域“跨省联席+数据共享”机制，在跨行政区域水系建立由生态环境、水利、农业等部门参与的协调机构，统一制定水质考核标准、污染防治方案和生态补偿规则。尤其要在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推广上下游水质联合监测机制，避免“各自为政”导致治理碎片化。此外，将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建立与GEP核算结果挂钩的政绩评价体系，将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效细化为水质改善率、生态产业产值占比等量化等指标，与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干部考核晋升直接挂钩。

未来，我国各地在推进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过程中，可借鉴江浙地区的制度创新经验，在生态价值量化核算、产权权能分层设计、补偿模式多元构建等关键领域实现突破，推动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局部试点探索向全国范围推广应用的系统性升级，助力达成“绿水青山”生态价值与“金山银山”经济价值的动态平衡。

（作者系中共宜昌市委党校讲师）

## 推动红色基因深度融入基层党建

□ 宋慧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淬炼的精神密码，蕴含着理想信念、人民立场和斗争精神以及纪律与创新的核心价值。将红色基因深度融入基层党建工作，既是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提升党建引领效能的关键路径。

红色基因凝结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灵魂，以“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根本立场，彰显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谱系的精髓。其核心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红色基因是党的初心使命的具象化表达，承载着“两个维护”的政治要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为基层党组织提供了明确的政治方向；红色基因蕴含的革命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头活水，通过红色故事、革命遗址等塑造基层党员的价值认同和精神品格；红色基因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为基层治理提供科学方法论。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红色基因成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思想武器。而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红色基因更通过激发党员干部的担当精神，推动“党建+治理”模式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落地。红色基因融入基层党建工作的具体路径如下。

构建红色理论学习体系需以系统性理论阐释为根基，结合时代特征创新教育形式，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温度的学习生态。红色基因作为党的精神血脉，其传承首先依赖于理论层面的精准解读与价值传导。基层党组织应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要论述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弘扬革命文化”“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的要求有机结合，纳入基层党员教育培训的核心课程体系。通过专题党课、红色读书会、理论研讨会等，系统阐释红色基因的历史渊源、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引导党员深刻体悟红色基因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本质、“两个维护”的政治要求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使抽象的精神符号转化为可感知、可认同的理论认知，夯实基层党建的思想基础。

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需突破传统单向灌输教育模式，借助现代技术手段构建沉浸式学习场景，增强红色理论教育的感染力与渗透力。例如，针对抗日战争起始地，依托本溪老边沟、关门山抗联交通站等178处革命旧址开发“重走抗联路”VR课程，使党员在沉浸式体验中理解抗联将士的钢铁意志；在解放战争转折地，以葫芦岛塔山阻击战为原型开发“塔山防线守护”AR沙盘，让党员亲手操控虚拟防御工事、部署兵力等，深刻领会“寸土不失”的战役精神。这样既延续了红色教育的本质属性，

又通过数字技术重构了学习体验，使革命精神在沉浸式交互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精神财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教育价值，通过创新性转化与融合性发展，能够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注入文化动能。红色文旅融合发展是激活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抓手，基层党组织可立足区域内的红色历史遗迹、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等资源，以党建为引领，整合自然景观、民俗文化与乡村振兴需求，打造集党性教育、文化体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文旅项目。

基层党组织也可通过修缮保护历史建筑、复原重要历史场景、开发主题研学线路等方式，将红色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使党员在参观学习中感受革命先辈的精神力量，同时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特色农产品销售等产业发展，形成“以红促旅、以旅兴农”的良性循环。

在推动红色文旅融合发展的同时，注重非遗活化与文创开发，进一步拓展红色文化的传播载体与表现形式。基层党组织可联合非遗传承人、文创企业，挖掘红色历史中的典型人物、感人故事、革命精神，并将其融入传统手工艺、民间艺术、节庆活动等非遗项目，通过创意设计开发红色主题的手工艺品、文化衍生品、数字文创等，让红色基因在基层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多维释放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并持续赋能。

地方基层党组织应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机制体系，将红色基因的传承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考核、可落实的制度规范，确保红色基因融入基层党建工作有章可循、有序推进。

在考核评价机制优化方面，应建立与基层党建目标任务相契合的考核体系，将红色基因融入基层党建的具体成效，如党员教育成效、红色文化传播力度、服务群众中红色精神践行情况等，纳入基层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党建工作考核以及党员民主评议的重要内容。通过制定涵盖“理论学习深度”“实践转化度”“群众认同度”等多维度评价指标，改变以往单一的文件传达、会议记录等形式化考核方式，形成“定性评价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过程考核与结果运用相统一”的综合考核机制，促使基层党组织将红色基因传承从“软任务”转化为“硬指标”，从被动落实转化为主动创新，有效破解红色基因传承中的形式主义问题。

同时，可将基层治理网格作为红色基因传承的基本单元，在现有网格化管理体系中嵌入红色文化传播与实践功能，明确网格员在红色基因传承中的双重职责，既要履行信息收集、问题处置等基层治理常规任务，更要承担起红色政策宣讲、红色故事传播、红色精神示范践行等文化传承使命，实现红色基因传承与基层党建工作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作者系中共铁岭县委党校）

## 聚焦政策执行力提升 深化党校专题研讨教学革新

□ 沈燕 张剑雄

政策执行力是联结宏伟蓝图与生动现实的关键桥梁，是检验干部队伍能力作风与政治担当的根本标尺。党校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渠道与主阵地，其核心任务不仅在于强化理论武装，更在于提升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履职能力。专题研讨，以其独特的互动性、思辨性与实践性，成为党校教学体系中淬炼干部政策执行力的关键环节。然而，要使其功能得到最大化发挥，就必须对其设计、过程与成果转化进行系统性审视与优化。

政策执行力并非简单的上传下达，而是干部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与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加以贯彻落实的综合能力。这既是对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集中检验，也是衡量干部是否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的试金石。一项决策部署能否从文件走向实践，从目标变为现实，关键在于执行。缺乏有力的执行，再好的顶层设

计也只是空中楼阁。因此，政策执行力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的巩固与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干部履职尽责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其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核心能力。

党校专题研讨区别于传统单向授课的显著特征，在于其鲜明的问题导向性与高度的互动参与性。这一形式为来自不同领域、具备不同实践经验的干部，搭建了围绕共同关注的现实难题开展思想碰撞与智慧分享的平台。干部学员可将自身在政策执行中遇到的困惑、瓶颈与挑战带入课堂，通过集体会诊的方式，在多维度的视角审视与深入交流探讨中，探寻破解之策。这种教学形式天然地将抽象的理论学习与具体的实践问题紧密地联结，使理论不再是悬浮的知识，而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锐利武器，进而成为理论联系实际最直接、最有效的载体。

要让专题研讨真正触及执行力的关键环节，首要任务是实现研讨主题的精准化与实践化。必须摒弃以往选题宏大空泛的

倾向，着力构建聚焦政策执行全链条关键节点的案例式、问题导向型主题库。选题应紧紧围绕政策在宣传动员、方案细化、资源整合、部门协同、风险管控、督查评估等具体环节中普遍存在的堵点与痛点，如可设置如何破解重大项目推进中跨部门协同不畅的难题、如何有效防范化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政策执行中的潜在风险等具体议题，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引导学员从小的切口入手进行深度开掘，确保研讨内容与干部工作实际高度契合，使其在思考与辩论中直接汲取提升执行能力的养分。

有了优质研讨主题，还需搭配科学的组织方式，确保研讨过程有效激发思想火花、促进能力提升，应积极引入结构化研讨、复盘推演、角色扮演等现代教学方法。结构化研讨通过设定明确的议程步骤、角色分工和发言规则，引导讨论从发散走向聚焦，从现象深入本质，有效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复盘推演则通过对真实政策执行案例进行全过程回顾分析，或设置未来情景进行沙盘模拟，让学员在

高度仿真的环境中反复锤炼预判力、决策力、协同力与应变力。这些方法的运用，将研讨过程从简单的观点交流，转变为高强度的、沉浸式的能力训练场，使政策执行力在深度的过程性互动中得以实战化生成。

党校专题研讨是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提升干部政策执行力方面肩负着特殊重要的使命。要充分释放其应有效能，就必须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局限，以提升执行力为核心导向，推动教学模式实现深刻变革。通过构建精准聚焦现实堵点的研讨主题、引入深化过程互动的科学方法，二者协同发力，方能推动专题研讨从单纯的知识交流平台，全面升级为集思想淬炼、方法启迪、能力生成为一体的执行力锻造熔炉。这既是提升党校教学质量的内生要求，更是为党和国家事业锻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干部队伍，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政令畅通、落地见效的必然选择。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 深化协商民主实践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 闫月

国家治理效能集中反映为国家在制度运行、政策执行以及公共服务供给时达成目标的能力和效率。当前，我国处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紧要阶段，对治理手段和决策水平提出了更高标准。协商民主是中国政治学理论里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着重通过对话、讨论与协商来形成共识，具备包容、参与以及理性审议特性，为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手段。因此，在国家治理效能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深入探究协商民主的政治学实践途径，对丰富民主治理理论内涵、优化决策过程、达成社会共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度程序并重 构建协商治理规范框架**

增强国家治理效能，需要把协商民主融入规范化的制度程序里，打造权责明确、运转高效的协商治理框架。

首先，要明确协商议题生成和确立的机制。设立常态化社情民意征集机制以及数据分析系统，让协商议题源自真实的公共需求和治理痛点。例如，把年度民生实事项目、重大公共政策草案等优先列入协商范围。

其次，需要对协商主体的遴选与构成规则进行细化，按照议题性质综合采取随机抽样、界别推荐、利益相关方邀请等手段，保证参与者具有广泛代表性和专业性，避免协商沦为少数群体的“自说自话”。

再次，要对协商过程中的议事规则与程序保障予以规范。引入且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等成熟机制。保障参与者平等拥有发言权、知情权和监督权，打造理性、包容的对话环境，让协商过程有序且卓有成效。

此外，需把协商成果认定与输出的标准予以固化，确定协商共识、协商意见等不同成果形式的认定标准与报送途径，让其作为后续决策不可或缺的参考内容。通过健全制度体系、完善协同程序，为协商民主实践提供稳定预期和刚性保障，推动其从临时性、随意化的活动，转变为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规范化环节，为持续提升治理效能筑牢坚实制度根基。

**平台渠道创新 拓展多元主体参与空间**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提升协商民主的实践成效，需凭借平台与渠道的持续革新，给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开辟更广阔空间。应推动传统座谈、听证等方式与新兴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搭建起线上线下协同、虚实结合的立体化协商平台体系。一方面，全力强化线下实体平台功能。促进人大代表联络站、政协委员工作室、基层社区议事厅等实体场所实现标准化、常态化运作，探索搭建打破部门、层级壁垒的专题协商平台，对复杂治理议题展开深度审议。另一方面，不断加大线上数字协商平台的开发力度，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集议题征集、信息发布、在线讨论、意见收集和数据分析于一体的智能协商系统。例如，通过开发专属手机应用或借助现有政务服务平台，开设“云端议事厅”，使公民突破时空限制，顺利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借助算法模型对海量民意开展智能聚类和分析，精准找出公共诉求的核心焦点夯实共识基础。

平台创新的关键是推动双向互动。不管是线下平台还是线上平台，均需重视设计互动性强、反馈及时的参与模块，如设计模拟决策场景的协商工作坊、有辩论和投票功能的线上议事程序等。搭建多层次、便捷的参与网络，可充分调动公民、社会组织及企业等各类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凝聚更广泛的民智民力，让公共决策更好地体现多元利益和价值，从根源上增强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成果转化落实 强化协商效能反馈保障**

协商民主的价值关键在于其成果切实作用于决策，推动工作改进，解决实际难题。因此，建立协商成果转化落实与反馈保障机制，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

建立协商成果的刚性督办制度。针对达成的协商共识，由党委或政府督查部门将其纳入督查事项，清晰确定责任单位、办理时间和质量标准，实施跟踪问效；针对未被采纳的意见建议，构建规范的说明解释体系。相关单位以书面形式反馈不采纳的理由，保证“事事有回音”。

建立科学的协商效能评估体系，此体系需突破“参与人数”“会议次数”等简单过程指标的束缚，聚焦“共识转化率”“政策调整率”“公众满意度提升度”等结果性指标，定期对重大协商活动实际成效展开评估，且将评估结果作为评判相关部门治理能力的重要参考。

需强化反馈和公开渠道的制度化建设，借助政府公报、官方网站、政务新媒体等渠道，定期向社会披露重要协商成果的采纳落实情况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此做法通过呈现协商的作用效果，增强公众对协商民主制度的信任和持续参与的积极性。建立从成果形成到督办、评估、反馈的全流程保障机制，切实防止协商民主沦为“空谈”或“形式”，使其成为推动政策优化、解决治理难题、增强民众获得感的有效手段，将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在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目标导向下，协商民主深化实践需制度程序、平台渠道与成果转化三条路径协同发力。通过构建规范框架保障协商的有序性，凭借创新平台扩大参与广度，依靠强化落实确保协商成效，让协商民主深度融入国家治理全过程。这不仅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实践探索，更是不断推动治理体系优化、治理能力提升，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战略抉择。

（作者系中共铁岭市委党校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副教授）